

September 2018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s Background of Disciplinary System

Hongchao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Hongchao. 2018.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s Background of Disciplinary Syste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4): pp.16-2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4/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中国现代“美育”概念的形成及其学制基础

王宏超

摘要: 中国现代美育概念的形成,一方面与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吸收了康德哲学中知情意分立的范畴。在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史中,从早期对“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强调,过渡到对“四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提倡,是对美育价值逐渐认同的过程。民国时期,美学及美育被大加提倡,且被推举到至高的地位,与王国维、蔡元培的研究与倡导密不可分。王国维早年译介西方教育学著作,受席勒和赫尔巴特的影响很大,这对其美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对其美育思想影响深远。在民初学制改革中,美育逐渐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但在此后的历史中,美育的地位也随着社会主导教育观念的变化而有所削弱。

关键词: 美学; 美育; 自律; 美育代宗教

作者简介: 王宏超,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美学、美学与艺术学理论、巫术与中国审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邮政编码:200234。电子邮箱:wanghongchao@shnu.edu.cn 本文系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中文)、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制度与知识谱系”[项目编号:17FZW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s Background of Disciplinary System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hina is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rite and music, and it also absorbs categories of Kant's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mphasis on "Three education" (moral,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four educatio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were highl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whose credit goes in large part to Wang Guowei and Cai Yuanpei's research and advocacy. Wang Guowei's earl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edagogical work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Schiller and Herbart,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Cai Yuanpei's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Leipzig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In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earlier Republic of China, aesthetic educatio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ts important status. But later on, the statu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declined with the change of dominant social educational concepts.

Keywords: aesthetics; aesthetic education; autonomy; aesthetic education as substitute for religion

Author: Wang Hongcha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aesthetics, magic and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 and comparative aesthetics. Address: No. 100, Guilin Road, Shanghai 200234, China. Email: wanghongchao@shnu.edu.cn Funding: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No. 17FZW031).

一、从“三育”到“四育”

在“美育”被正式地提出之前,有“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提倡在先。中国现代最早对“三育”观念的介绍源于严复。德、智、体,是严复对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年)著作中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的翻译。他的翻译并非是以教育宗旨为目的,而是为了揭示强国国民所必备的几个要素(王尔敏 139—40)。

在1895年3月4日至3月9日天津《直报》连载的《原强》中,严复就提到了“民智、民力、民德”乃自强之本(严复 14),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亦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18)。毋宁说,此时严复的“三育”观念与传统“六艺”与“三达德”(智、仁、勇)的内涵更为接近,而与现代“三育”说的含意则有很大区别。就“三育”与传统“六艺”的对应关系看,德育近乎礼、乐,智育近乎书、数,而体育近乎射、御(王尔敏 139—40)。这种形似神异的比较,恰恰说明了中西教育各自独具特色。

如果说严复最早关于民智、民力和民德的介绍只是就一般国民素质进行的论说的话,此后严复就开始把这些要素同教育结合起来了。这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通用做法——寻找到一种理论,通过教育的手段加以普及。1906年6月15日,严复在上海青年会发表演说,题为《教授新法》。^①其中明确提出了“三育”(德育、智育、体育)说:“不佞今夕所谈,趋重智、德二育。体育虽重,于此一及,不更及矣”(严复 279)。但其论说的依据已经不是斯宾塞和中国传统的“六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已经化入他的言论,即智、情、意分立观念。这一点,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已经指出:“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孟德斯鸠 6)。

于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早期的“三育”概念有两种涵义,一是德育、智育和体育,一是德育、智育和美育。在前一种分类中,智育实则包括后来所谓的智育(狭义)和美育。原因如严复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中所说:

心如形体,有支部可言,有思理,有

感情。思理者,一切心之所思,口之所发,可以是非然否分别者也。感情者,一切心之感觉,忧喜悲愉,赏会无端,揽结不尽,而不可以是非然否分别者也。(严复 279)

尽管严复倡言德、智、体三育,但他最为看重的是其中的智育。而智育包括理、情两端,以科学与美术为代表。而事实上,他认为美术对于德育的促进作用更大:

以心之方面常分为二如此,故其于人也,或长于理而短于情,或长于情而短于理。如卢梭自谓生平于学术物境,强半得诸感会,非由思理而通,可知其人受质之异。譬诸文章、论辩、书说,出于思理者也;诗骚、词赋,生于感情者也。思理善,必文理密,察礼之事也。感情善,必和说微,至乐之事也。西人谓一切物性科学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术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二者往往相入不可径分。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而教育之事,在取学者之心之二方面而并陶之,使无至于偏胜。即不然,亦勿使一甚一亡。至于一甚一亡,则教育之道苦矣。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术,而智育多用科学。(严复 279—80)

严复的德、智、体三育说,其实已经包含了德、智、体、美四育说的萌芽。^②

甲午后学习日本的潮流中,对于教育思想和制度学习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日本学制之中,以德育、智育和体育三者为宗旨,这在有关史料中多有提及。杨荫栋、周祖培(1793年—1867年)翻译日本学者成濑仁藏所撰《女子教育论》,“分宗旨、德育、智育、体育四类”(顾燮光 279)论述。吴汝纶于此也有详细介绍,他在《东游丛录》中引述《佛国小学校教育课程》曰:“教育分三种: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吴汝纶 700)。另引《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松井次郎兵卫来书》曰:“抑体育者,教育之基础,富强之渊源,而天下之得失系焉”(750)。“完全教育,精神之修养,与身

体之训练,不可离矣”(751)。是时西方和日本把德智体三育作为教育方针,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如吴汝纶在日期间会谈日本学者:“伊藤来谈教育之法,谓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676)。沈兆祯在《新学书目提要》亦称“泰西言教育者率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分举”(414)。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在评述《实用教育学》(日本越智直、日本安东辰巳郎合著,张肇桐译)时亦指出此书“论智育、体育、德育,即《中庸》所谓三达德,足为中外古今一理之据”(沈兆祯 277—78)。

如上述,严复已经不囿于西方和日本的传统提出“四育”(德智体群)之说,且已经暗示“美育”思想的出现。在这一点上,时人亦有同道者。海门季新益笔译日本著作《教育学原理》(日本东京教科书辑译社本,日本尺秀三郎、中岛半次郎讲述),已经不满于三育的范围而增加了“情育”一项:

(此书)颇引西国大儒论学之言,可为准则。近来谈教科书者以智育、体育、德育并列为三,盖本于希腊阿里士多德之旨,此书独增情育一条以补其未备,感化一篇所推各节即情育之事也,盖略出于卢骚、康德之绪论,其发明新理尤多,皆本于心得而课之事实,有足取焉。(沈兆祯 413—14)

“情育”与“美育”异名同实,尽管中国向之学习的日本没有明确的“美育”观念,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为养成“完全的人”而探索新的方向了。

二、王国维:“养成完全之人物”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沿袭日本者甚多。但对于美育方面的内容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舒新城说:“光绪二十九年的新教育制度,对于日本学校的种种方法,大概抄得很全备,而独不及美育”(舒新城 114)。这话虽不中,亦不远。说其不中,乃是因为晚清的学制中已经有了关于审美教育的内容,如对于音乐、美术的逐渐强调。说其不远,乃是因为,晚清学制中的美育思想,囿于实

用或伦理的目的,尚未走向自身的独立。

在对于新学制的思考中,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育类内容的缺失,是新学制的重大失误之处。王国维对于哲学、美学的论述,为这两个学科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同样,他对美育的呼吁,最早开启了中国现代的美育思潮。

在译自日本人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中,王国维最早提到了“美育”,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意义重大。此书指出:“教育之目的,一言以蔽之曰:在养成完全之人物。”课程设置:“合修身、国语、历史、地理谓之文科,合博物、理、化、数学谓之理科,合习字、图画、唱歌谓之技艺科。又文、理科之教育,谓之智育;图画、唱歌等,谓之美育。或以关文、理、艺三科之教育为智育,关修身科之教育为德育,关体操科之教育为体育”(《王国维全集》第十七卷 496)。有学者指出,本书“明确提出了智育、美育、德育、体育四育思想,其中美育的提出在中国教育界是首次,尽管这还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主张,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肖朗 47)。

知情意的分立思想,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知识体系确立的思想基础。王国维对于西方思想的接引,即是以此为基点的。他由此确立了哲学、美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同样,把这一思想运用到教育领域,自然就出现了强调美育的结果。如果说王国维在哲学上受到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甚大,那么在美育思想上,则从席勒和赫尔巴特那里得到了许多启示。

王国维敏锐地观察到了席勒在西方首倡美育的思想背景:

希尔列尔之美育论,盖鉴于当时之弊而发。十八世纪,宗教之抑情的教育犹跋扈于时。彼等不谋性情之圆满发达,而徒造成偏颇不自然之人物,其弊一也。一般学者惟知力之是尚,欲批评一切事实而破坏之,其弊二也。当时德国人民偏于实用的利己的,趣味甚卑,目光甚短,其弊三也。知此,则读彼之美育论者,思过半矣。(“希尔列尔”5)

要之,宗教使人失去自由之本性,理性发达造就鄙陋之世界,趣味日趋实用。席勒的目标即是

使人摆脱外在的束缚,通由美育达致自由的境界。就智、情、意三界来说,各有自我的领地,各有自律的空间,各自的价值不能僭越分别独立的范围而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与过去以美术为道德之助的观念相反,席勒反倒认为“美术者,科学与道德之生产地也”(《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 16)、“真之与善,实赅于美之中”(“希尔列尔”5)。所以,就教育而言,不能只是关注于德育,对于美育要更加重视:

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最深之意义之艺术也。一切学问,一切思想,皆以此为极点。人之感情惟由是而满足而超脱,人之行为惟由是而纯洁而高尚。其解美术文学也如此。故谓教人以为人之道者,不可不留意于美育。(王国维,“希尔列尔”5)

无疑,这些思想都逐渐融化进了王国维的思想之中。

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年—1841年)对于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也有所影响。在西方教育史上,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创立了完整的教育学体系,标志着教育学学科的诞生。1900年前后,赫尔巴特理论在日本甚为流行,中国对于西方教育理论的引进,最初以日本为主要渠道,所以中国所引入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论著作亦占有很大比例。据学者不完全统计,近代中国“出版的教育学书籍约有64种(包括讲义和报刊连载),其中直接注明译自日人著作和日人讲述的有36种,其余相当部分由国人依据日著原本编译,包括一些留日师范生编译的著作。在这些译著中,由日本著名的赫尔巴特学派倡导者大濂甚太郎撰写的就有5种,居所译个人著作的首位;另一位重要代表波多野贞之助编写的讲义有3种,居所译讲义类首位。从我们所查阅、接触到的部分著作看,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主导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田正平 326)。

王国维主持的《教育世界》中,曾对于赫尔巴特进行过详细介绍,有关文章如:《海尔巴脱派之兴味论》(《教育世界》,第75号,1904年5月)、《肖像·德国教育学大家海尔巴脱氏》(《教育世界》,第80号,1904年8月)、《德国教育学大家海

尔巴脱传》(《教育世界》,第80号,1904年8月)、《德国海尔巴德派教育学会纪事》(《教育世界》,第120号,1906年3月)等。1901年,王国维翻译了日人立花铣三郎讲述的《教育学》。王国维译此书是“以德国教育家留额氏所著书为本”(本书小序)的。而“留额氏”是德国教育学家戚勒(Tuiskon Ziller, 1817年—1881年),其所据的原本是戚勒的《普通教育学概论》。戚勒为赫尔巴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尔巴特进入中国,即是以王国维翻译的这本《教育学》为最早。赫尔巴特的思想以康德哲学为基础,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继承和发挥了康德关于智、情、意划分的思想。王国维日后对于康德、赫尔巴特的学说译介甚多,且对基于这一思想基础的美育大加提倡,可能在此时已经奠定基础。已有学者指出:“日后王国维撰文提倡四育并成为近代中国美育的首倡者,应该说与他翻译[……]接受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理论不无关联”(肖朗 47)。

同现代诸多思想家一样,王国维十分重视教育,视其为培育“完全的人”的途径。罗振玉因在湖南推进教育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奉旨修订学制,罗振玉亲赴日本考察教科书,发表诸多言论,对于新学制的产生,助益甚多。王国维也由此瞩目于教育,并主持《教育世界》存在七年中的六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署名文章有四十多篇,加上未署名者,可能达到九十多篇。^③他在多篇文章中,为哲学、美术(艺术)的独立价值而大声疾呼。如果说这是王国维鉴于现代性的敏锐视野而对传统进行的有意识的推动,那么对于美育的倡导,则是他超越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深入思考。美育的核心在于养成“完全的人”,以“美丽之心”主导生活。尽管亦有思想家提倡“完全的生活”,但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完全的生活”的典范相比,性质迥异:

前者仅指物质的现象,后者则于灵魂之无穷之运命亦赅而言之也。实则希腊思想所远赋于近时世界者,即所谓“美”是已。柏拉图于《理想的国家》中,有言曰:“使吾人之守护者,于缺损道德的调和之幻梦中,成长为人,吾人之所不好也。愿使我技术家有天稟之能力而能辨别‘美’与‘雅’之真性质,则彼辈青年

庶得拓足于健全之境遇耳。”以言高尚之训练，殆未有逾此者也。“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罗马人之理想也；而“美之精神宿于美之身体”，则希腊人之理想。吾人既欲实现前者之理想，亦愿实现后者之理想。（“霍恩”3—4）

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有偏狭之处，不能达于完全的境界：

意识者，不但有知的意的性质，又一面有情的性质。而美之感觉，实吾人感情生活中最高尚之部分也。偏于智识则冷静，偏于实际则褊狭，知所谓美而爱之，则冷者温，狭者广矣。人之灵魂，对偏于智识者而告之曰：“汝亦知智识而外，尚有不能以知识记载者乎？”又对偏于实际者而告之曰：“汝知人世所谓有益者之外，尚有有价值者乎？”真理之智识使人能辨别事物，而不能使之爱好事物。善良之意志足以匡正人心，而不足以感动人心。欲使人间生活进于完全，则尚有一义焉，曰：真知其为美而爱之者是已。（“霍恩”5—6）

培养“完全的人”，以避免性与理之分裂而造成的弊端，是王国维美育思想的中心议题。但这一目标却不那么容易达到，这可以从他后来“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困惑中表现出来。但作为教育理想，这一追求则可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三、蔡元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奠基者

在写于1931年的《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蔡元培说：

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 *Ästhetische 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在古代说音乐的，说文学的，说书画的，都说他们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就是美育的意义，不过范围较小，教育家亦未曾作普及的计划。最近二十五年，受欧

洲美术教育的影响，始着手于各方面的建设，虽成绩不甚昭著，而美育一名词，已与智育、德育、体育等，同为教育家所注意，这不能不算是二十五年的特色。（第七卷 79）

实则在蔡元培于1901年10月至12月间翻译的《哲学总论》中，已经提到了美育：“教育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第一卷 357）。这一点，已为学界所注意。^④

蔡元培一生中经历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型。戊戌后不满于京城的政治氛围，辞官出京，从“庙堂”走向“民间”，从翰林转而从事教育和革命。此为第一次的思想转型。从事教育和革命的几年间，困难重重，风波不断，导致蔡“意颇倦”（第三卷 666），遂有留学之念。后几经转折，终于1907年7月11日到达德国柏林，开始了其“游学时代”（第三卷 666），是为其思想的第二次转型。对于美育，蔡元培抱以终身的兴趣，在写于暮年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中，蔡元培不无遗憾地说：“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第七卷 48）。此以终身的兴趣，就是源于其留德生涯。舒新城因此说：

美感教育的倡议，要以民国元年为始，首倡者为蔡元培。蔡为浙江绍兴人，清末即投身民党而努力于教育事业，光绪三十一年因上海之图谋不遂，乃去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美学，而尤深感于德国的美育设施；且其根本思想倾重于世界主义，以美能颇人我之见，故极力提倡美感教育。中国十余年来的美感教育思想，实以他作为唯一的中坚人物。（舒新城 115）

此说甚确。蔡元培初入莱比锡大学，“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第三卷 666）。其时西学思潮激荡，蔡元培入得宝库，未免有些眼花缭乱，心有囊括西方学术的想法，不难理解。其后，他逐渐意识到博

通还要精专的道理,于是读书范围“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第七卷 31;第十七卷 457),他说:“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第

七卷 48),即指这个阶段。这些变化可从他在莱比锡大学的听课记录中看出来。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所选修课程一览^⑤

学期	课 程	讲授者
第一学期(1908 年冬—1909 年初)	自康德至现代之新哲学的历史 (Geschichte der neuesten Philosophie von Kant bis zur Gegenwart)	Wundt(冯德)
	心理学概论 (Die Grundlagen und Hauptpunkte der Psychologie)	Lipps
	德国文学之最新发展 (Die jüngsten Entwicklungsstadi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Witkowski
	语言心理学:第一部分,普通心理学基础 (I. Teil: Allgemein-Psychologische Grundlegung)	Dittrich
	叔本华(Schopenhauer)	Brahn
	歌德:哲学家及自然科学家(Goethe als Philosoph und Naturforscher)	Brahn
第二学期(1909 年夏季)	心理学(Psychologie)	Wundt
	近代及现代德国文化史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jüngste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Lamprecht
	现代自然科学之主要成就 (Hauptergebnisse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Brahn
	儿童心理学及实验心理学 (Kinderpsychol. u. experimentelle Padagogik)	Brahn
第三学期(1909 年冬—1910 年初)	哲学入门(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Bichter
	新哲学之历史及早期之心理学概论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mit einleitender Übersicht über die älteren Psychologie)	Wundt Wirth
	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史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h.)	Köster
	歌德之戏剧(Goethes Dramen)	Witkowski
	自古代至现代之德国文学概论 (Kursorischer Überblick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r Gegenwart)	Witkowski
	远古及中古时代德国文化史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in der Urzeit und im Mittelalter)	Lamprecht
	近代德国文化史:世界观及学术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jüngsten Vergangenheit: Weltanschauung und Wissenschaft)	Lamprecht

续 表

学期	课 程	讲授者
第四学期(1910年夏季)	康德之后的哲学史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nach Kant)	Volkelt
	伦理学之基本问题(Grundfragen der Ethik)	Volkelt
	心理学方法(Psychologische Massmethoden)	Wirth
	心理学实验室(Psychologisches Laboratorium)	Wundt
	德国戏剧及演艺艺术史章节选读并附研究资料 (Ausgewählte Kapitel aus der Geschichte des Theaters und der Schauspielkunst in Deutschland mit Anschauungsmaterial)	Köster
	关于史学方法及历史艺术 (Übergeschichtliche Methode und geschichtliche Kunst)	Lamprecht
	宗教改革及文艺复兴时代之德国文化史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Renaissance)	Lamprecht
第五学期(1910年冬—1911年初)	心理学实验室(Psychologisches Laboratorium)	Wundt
	希腊哲学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Volkelt
	美学(Aesthetik)	Volkelt
	新高地德语文法:心理学基础 (Neuhochdeutsche Grammatik auf Psychologischer Grundlage)	Dittrich
	绝对论时代德国文化史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Lamprecht
	文化之启始与原始形态(Anfänge und Urformen der Kultur)	Weule
第六学期(1911年夏季)	康德哲学(Die Philosophie Kants)	Volkelt
	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	Wundt
	心理学实验室(Psychologisches Laboratorium)	Wundt
	歌德《浮士德》注解:第二部分 (Erklärung von Goethes Faust, II. Teil)	Köster
	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之舞台发展 (Die Entwicklung der Bühne vom 15.—20. Jhdt)	Köster
	古典主义时代德国文化史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in der Zeit des Klassizismus)	Lamprecht
	古代希腊雕刻艺术选读 (Ausgewählte Werke der älteren griech-Plastik)	Schreiber
	罗马时代之建筑及雕刻 (Architektur und Plastik der roman. Epoche)	Graf Vitzthum Von Eckstädt
	莱兴之 Laokoon: 艺术对美学的贡献 (Lessings Laokoon als Beitrag zur Aesthetik der Bildenden Künste)	Schmarsow
	古代荷兰名画:自 H. U. J. Van Eyck 至 Q. Metsys (Altniederländische Malerei von H. u. J. van Eyck bis Metsys)	Schmarsow

历史总有巧合之处。在莱比锡学习三年的蔡元培于1911年11月4日获得了修业证书。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权动荡。蔡元培于11月5日接到陈其美(1878年—1916年)催其回国的电报(蔡元培,第八卷366),加上“同人之劝”,于是“决计回国一次”(第十五卷438)。尽管章太炎(1869年—1936年)曾发表宣言推举蔡元培出长学部(高平叔,第一卷391),但在孙中山(1866年—1925年)和黄兴(1872年—1916年)的心中,最初考虑的教育部长人选,均非蔡元培。孙中山拟提名章太炎长教育部,因人反对而改作了蔡元培。而章太炎则因为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对于蔡元培参与其中曾加以阻扰(高平叔,第一卷396—97)。这些事件表明,蔡元培最终入主教育部,肇因是政治势力间的博弈。^⑥但恰是这次貌似偶然的巧合,把蔡元培推上了民国政治、社会、教育、学术活动的中心,使得国势衰落的民国有了思想勃兴的幸运。

蔡元培主持的民初学制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最为显要者,无疑是处于蔡元培教育思想中心的美育。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短短一个月后,他即发表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⑦一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也为民国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方向。

蔡元培此文乃是有感而发者:

是时,陆费伯鸿君方主任商务印书馆之《教育杂志》,曾语予民,谓“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然予民意以为未足,故宣布《蔡子民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谓:“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因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予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第三卷667—68)

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倡导,出于两方面的基本考虑。其一,蔡元培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判断,

即把近代西方文化概括为“科学”和“美术”(即“美学”)。如他在1917年1月1日发表的著名演说《我之欧战观》中,把欧洲诸强盛之原因归结为“科学”与“美术”之发达。“据鄙人观察以为,第一因科学之发达,第二因美术之发达”(第三卷1—2)。他对于科学在当时世界中的统治地位有充分认识,认为当今为“科学万能时代”(第三卷497),在他主持的学校和教育部以及后来的中央研究院,都把科学的推广、教育作为重要目标。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的作用和局限,认为文化的健全发展,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必须提倡“美术”。蔡元培认为,战争需要军民及国民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有取胜的资本。而道德的养成,或认为由于宗教,其实不然。(“至道德之养成,有谓倚赖宗教者,其实不然。”)如俄国在几个大国中最为重视宗教,但“战争中之国民道德,乃远不如德、法,可见宗教与道德无大关系矣”(第三卷3)。所以,道德的养成另有根源。“然则法、德两国不甚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有道德心?此即美术之作用。大凡生物之行动,无不由于意志。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美术之作用有两方面:美与高是”(第三卷3)。其二,是由于蔡元培的教育救国理念。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第三卷641)。“改良社会,首在教育”(第三卷65)。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成为美育提倡合法性的基础。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倡导,并不只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他着眼的其实是更为根本的文化和道德拯救之道,在他看来,这是扭转中国贫弱受欺现状的最终道路。

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文中对美育思想进行了详尽论述。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实体界。在他看来,新教育方针中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是属于现象界的教育,目的是满足于政治上的要求。但“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第二卷11)。人不能仅仅去追求现象界的相对和短暂的价值,应该从现象界达及实体界,追求超越性的价值。他认为,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是由教育来实现

的。教育包含有多个部分,不可能每一部分都有这种跨越现象和实体世界的能力(如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体育等),教育对两个世界的连接,实依靠于美育。美育即美感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第二卷 13)。

而美感何以有此功能呢?这是由美感的特点决定的。在这里,蔡元培再一次借用了康德的说法,认为美感有四个特点:超脱、普遍、有则、必然。他认为,人类共同之最高目的,不外乎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最大阻力,是人的专己性。而美感具有超脱和普遍的特性,实为专己性之良药。“人既脱落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第二卷 14)。至此,蔡元培揭示出了美育的最终价值,我们也由此清楚了他大力提倡美育的良苦用心。

从思想来源上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受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

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第六卷 599)

蔡元培对西学深有造诣,又对传统学术有精深理解,使得他的美育概念并非仅是西方术语的简单译介,他在完成这一命题的同时,也在联结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尝试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思潮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它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

结合起来”(列文森 93)。蔡元培就是能够“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中国思想家的代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主要表现。

在此后的临时教育会议上,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自己的教育主张进行了陈述。^⑧最终,教育部于1912年9月2日发布《教育宗旨令》:“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陈元晖 661)。确立了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核心地位。

四、美育的命运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说:

美育在世界教育史上本来是一位后进,在中国新教育史上更是后进。光绪二十九年的新教育制度,对于日本学校的种种方法,大概抄得很全备,而独不及美育。学制系统未建立以前的学校,固然是为着方言、军备等教育思想所支配,为达特殊的目的而设立,其不注意美育,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奏订学堂章程,除了高小与中学为着实用起见而有图画科目外,寻常小学、蒙学堂亦无图画;美育的要项的音乐则各级学校概无之。二十九年的改订章程,中学与高等小学有图画科,其目的与前次无异,高小但书可加手工,初小但书可加图画、手工,师范学堂与中学同,音乐仍全部无之。学校有图画、音乐科虽不能说一定实施美育,但此二者究为艺术科目,设置之亦尚有美育的基础。两次学堂章程,竟对此不加注意,当时国人对于美育的漠视——甚且无此观念——可以概见。(舒新城 114)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壬寅-癸卯学制中美育——具体说来是音乐、美术科目——的设置和实行情况。尽管如上所言,有了音乐、美术不见得就算是完全实施了美育,况且早期对于艺术类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但是,有了这些具体课程,就有了实行美育的基础。

壬寅-癸卯学制中稍具美育色彩的是1907年

3月8日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学堂章程》，其中关于音乐、美术科目的界说，有了些许“尚美”的追求。此前公布的章程中没有女学内容，在《奏定女学堂章程折》中说明了忽略女学的失误和中国古代一贯重视女学的传统。之所以这次修订章程对于艺术类内容有所增加，概因女学的特点而定，而非教育方针之改变。这一点舒新城也有说明：

壬寅、癸卯两次公布的学制系统均未言及美育，此次单独奏订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而具美育意味者，是因为初次改行新教育制度的目的，在藉学校以行新政，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美育当然不在他们底注意范围之内；而女子教育在当时则视为与国计民生无关的东西，其功能仅在于有妻相夫，有母训子，所以讲讲美育也可。（舒新城 115）

《奏定女学堂章程折》中的音乐、美术课程

女子师范学堂	图画	“其要旨在使精密观察物体，能肖其形象神情，兼养成其尚美之心性。其授课程度，授写生画，随加授临本画，且使时以己意画之，更进授几何画之初步；并授以教授图画之次序法则。”
	音乐	“其要旨在使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有裨风教者。其授课程度，授单音歌、复音歌及乐器之用法；并授以教授音乐之次序法则。”
女子初等小学堂	图画	“其要旨在使观察通常形体，能确实画出，兼养成其尚美之心性。……授图画者，务就他教科中所授之物体及生徒日常目击之物体图画之，兼养成其好清洁、尚密致之品性。”
	音乐（随意科）	“其要旨在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

美术、音乐课程虽已在学制中出现，但并没有得到上至学部官员，下至一般大众的重视。原因在非救国图强之要务、师资不够等。

真正意义上对于美育的提倡，始于蔡元培。蔡元培留学期间对于美育详加关注，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对于美育思想有系统之阐述。在其主政的民国教育部，于1912年9月2日，公布教育宗旨令：“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民初学制虽是在蔡元培以及诸多新派知识分子努力下制订的，但取法晚清学制的内容很多。但最为注目的是在学制中加入了艺术类科目，此可视为民初与晚清学制的明显区别：“民国教育制度是由清末的现行教育制度递嬗而来，即各校课程亦多与清末所订者无大出入。惟有普通教育中之艺术课程则有很大的差异。在科目上，清末之中小学固无音乐一门，即图画亦系为应用而设。民国初元（1912年）公布之中学令施行细则，均有音乐、手工、图画的美育科目，而且均以美感为目的”（舒新城 132）。学制虽沿袭甚多，但宗旨既变，旨趣则异。壬寅-癸卯学制中对美术、音乐等艺术类课程持实用态度，壬子-癸丑学制则以此为追求美感的工具。

袁世凯上台后，民国教育宗旨立变。1915年1月1日的《袁世凯颁布教育宗旨令》中对于美育已不再提及。“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者智育外，并重体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8）。倡言“崇实”，并说：“崇实之道，分两项言之。一曰物质之实在，如数学科、理化科等，皆国民知识技能必需之学科也。不得徒事纸上之研究，必验之实际，以为利用厚生之道。一曰精神之实，若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皆立国之大本大原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9—30）。既“充实”，就要“黜虚”，而虚者，首属美育。稍后发布的《教育纲要》，基本上就排除了美育的地位。“申明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以命令颁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6）。并详加述说曰：“现时教育最大之缺点有四：一不重道德，二不重实利，三无尚武精神，四不切实用。教育部前颁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各教育，惟未标明实用主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6），矛头似乎就是针对美感教育而发。

后来袁世凯下台，其所颁布的《教育纲要》也随即被取消。1916年8月，教育部提议取消纲要。“根本上取消纲要。（理由：）此《纲要》产生于酝酿政变时代，所载各款多与教育原理不合，建设一类，现时亦不能定为标准”（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 46)。1919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计划书》，重新提倡美育。其关于“社会教育”部分第四条曰：“筹设美术馆：美感教育极关重要，中国美术馆尚付阙如，亟宜筹款设立，并办理提倡美术事宜。”第六条曰：“提倡文艺音乐、演剧：普通社会不予以高尚之娱乐，则无以增高其思想，陶采其品性。文艺、音乐、演剧皆人民娱乐之所寄，惟宜力趋于高尚者，故是项事业亟宜提倡或补助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6）。美育似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玩偶，还算幸运的是，经过波折，美育终于被承认了。

就社会影响而言，蔡元培首倡美育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其价值逐渐被社会所公认，首要的原因就在于美育在学制中得到了确认。五四运动之后，因社会思潮之激荡，更使得美育得到了发扬：

蔡元培十余年来常有提倡美育的文章发表，但在五四以前，社会上竟少反应。自经李石岑在《教育杂志》上提倡以后，美育思想遂普及于一般教育界，李石岑底提倡与《教育杂志》底发行力固然很有关系，而五四后的大同思潮却有更重大的关系。因为五四运动而后，中国底旧文化固然发生重新估价的问题，而清末以来的功利主义的教育更不足以敌欧战后的国际思潮，于是外国的种种思想，也因固有思想的解放与新思想的要求而输入。美的教育一经提倡，便沛然盈溢于一般教育者之脑中，而普及于一般社会。倘若没有五四运动作背景，《教育杂志》之倡导，纵不如蔡氏在民国八年（1919）以前所得的结果，也决不会蔓延得如此之快。（舒新城 133—34）

东西方文化之争的起端是因为对于西方文化的反思，在反思中中国新型知识分子试图重新确立东西文化的地位。维护传统的一派在礼乐文明中发现了拯救西方文明弊端的药方，美育的提倡，就是具体途径之一。所以，五四之后美育地位的上升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且看《教育杂志》上那首著名的关于美育的新诗：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慢说现时美育用不着！
中国全身都在疼痛中，
美育也是治一部分的灵药。

你说是“衣食足然后礼义兴”，
美育不能当饭吃，当衣着。
然而多少饱食暖衣的大人先生们，
“坐于涂炭”而不知齷齪！

都由美感太疲麻，
人生蹉跎无可乐；
又何怪日长无事的太太们，
怀着胎儿又麻雀！

唉！可怜的人生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谁说美育现时用不着！^⑨

注释[Notes]

① 此演说原稿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上部分残缺，无题，《严复集》拟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参考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8页。

② 四育说另一表现形式是德、智、体、群四育。群育的萌生亦肇始于严复，他结合中国古代“群”的思想，来译Sociology，并使得“群”的思想进入到了中国近代教育宗旨之中。详见王尔敏：“德、智、体、群四育的缘起”，见王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1—55页。

③ 见于佛维的多种考证：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维校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佛维：《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④ 谭好哲、刘彦顺等著：《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一书以1903年8月王国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为最早阐述“美育”的文献：“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维刊于1903年8月《教育世界》56号上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不仅明确使用了‘美育’一词，而且也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美育之价值与功用的历史文献。”见该书第8页。

⑤ 有关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所修课程的统计，综合参考了以下几种资料：费路（Rola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北京：旅游教

育出版社,1989年)。陶英惠:《蔡元培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⑥ 蔡元培本人亦说:“回国,于同盟、光复两会间,颇尽调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传略》(上)(1919年8月),《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667页。

⑦ 此文曾刊载于《民立报》,1912年2月8、9、10日;《教育杂志》,第3卷第11号,1912年2月10日;《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本文原名《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题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⑧ “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1912年7月),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48页。

⑨ 原诗无题,本题为引者所加。就丽:“美育诗”,《教育杂志》14.6(1922):7。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佛维:《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Bi, Chu. *A Study on Wang Guowei's Philosophic Transl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Cai, Yuanpe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i Yuanpei*. Ed. The 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f Cai Yuanpe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Chen, Yuanhui, ed. *Re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7.]

费路:“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论蔡元培》,蔡元培研究会编。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

[Felber, Roland. “Cai Yuanpei at Leipzig University.” *On Cai Yuanpei*. Cai Yuanpei Research Society, ed.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1989.]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Gao, Pingshu. *The Chronicle of Cai Yuanpei's Life*.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8.]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熊月之主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Gu, Xieguang. “Indexes to Translations.” *A Summary of the Catalogue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ong, Yuezhi, ed.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7.]

就丽:“美育诗”,《教育杂志》14.6(1922):7。

[Jiu, Li. “Aesthetic Education Poetry.” *Journal of Education* 14.6(1922): 7.]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伍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rans. Zheng Dahua and Wu J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Montesquieu, Baron de. *The Spirit of Law*. Trans. Yan Fu.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1.]

沈兆祯:“新学书目提要”,《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熊月之主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Shen, Zhaowei. “A Summary of the Catalogue of Western Learning.” *A Summary of the Catalogue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ong, Yuezhi, ed.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7.]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Shu, Xincheng.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07.]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Sun, Yingxiang. *A Chronicle of Yan Fu's Life*.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Republic of China (Vol. 3.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1.]

谭好哲 刘彦顺等:《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Tan, Haozhe and Liu Yanshun. *The Signific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

[Tao, Yinghui. *A Chronicle of Cai Yuanpei's life*.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76.]

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Tian, Zhengp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 Volum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尔敏:“德、智、体、群四育的缘起”,《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Wang, Ermin. “The Origin of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A Sequel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5.]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Wang, Guowei.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Guowei*. Eds. Xie Weiyang, and Fang Xinliang.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霍恩氏之美育说”,《教育世界》151(1907):1—9。

[---. “Horne’ Though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ducation World* 151(1907): 1-9.]

——:“教育之家希尔列尔”,《教育世界》118(1906):5—6。

[---. “Educator Friedrich von Schiller.” *Education World*

118(1906): 5-6.]

——:《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 *The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Works of Wang Guowei*. Bi Chu, e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3.]

吴汝纶:“东游丛录”,《吴汝纶全集》(第三册),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

[Wu, Rulun. “The Record of Travel in Jap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u Rulun*. Vol. 3. Eds. Shi Peiyi and Xu Shoukai. Hefei: Huangshan Press, 2002.]

肖朗:“王国维与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导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6(2000):41—49。

[Xiao, Lang. “Wang Guowei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2000): 41-49.]

严复:《严复集》,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Yan, Fu.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an Fu*. Ed. Wang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责任编辑:王峰)